



# 5月2日

□ 贾富彬

5月2日,在县城和几个高中同班同学吃过午饭后,回到二弟家,家里没有人,知道二弟肯定去了他的小菜园。我没有打电话联系,就直接过去了。

南樊路北是王土城村拆迁新建的“湖西印象”小区,路南是没有被征收的几家村民的宅基地。弟弟家还有几分宅基地,用一些拆迁剩下的破砖碎瓦围了一个院子,用来种蔬菜,还养了几只鸡和鸭,没有住人的地方。到达院子时,二弟一个人在收成熟的油菜籽。他看见我,说了句“大哥回来了”,继续低头干活。我问他:“咱娘呢?”“去咱姥娘家还没回来。”姥娘已经101岁了,平时跟着舅生活,舅今年75岁了。79岁的母亲每两周从聊城回单县一次,陪姥娘住两三天,给姥娘洗洗澡,洗洗床单、衣服。

我是5月1日中午到单县的,一直和同学朋友聚会,2日下午才见到二弟。想想过去的一二十年,每年春节或者其他小长假回单县,住三四天,主要是和同学朋友交流,和二弟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,突然觉得既然是回家了,就应该多陪陪家人,心里决定下午谁都不联系了,哪里也不去了,陪二弟两个小时,和他说说说话。我说:“你歇歇吧,我带的樱桃有些坏了,天太热,你挑挑好的洗洗吃点。”二弟说着“不大喜欢吃樱桃”,拿了个塑料盆,坐在马扎上,开始挑选樱桃。我也找了个马扎,坐在他对面。我问他:“牙镶的可以吗?吃饭方便吗?”近几年他掉了好几颗牙,影响了咀嚼,前年我知道后让他去种牙,他和弟妹一打听种牙需要两三万元,不舍得,一直拖着,吃饭很受影响,体重从180多斤降到150多斤。我说:“抓紧去种牙吧,我给你赞助点。”催了很多次,终于在今年春节前种上了牙,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。二弟说:“吃饭很得劲儿,今年又吃胖了。”

二弟和我从小都比较内向,我不问他话,他不主动说,我也没有多少话题,就坐在那里看他挑选樱桃。他抓了两把洗了两遍,让我吃,我说刚吃饱饭,先不吃了。二弟吃了几颗,说:“晚上带回家让小孩儿们吃吧。”二弟站起来,从一个案板上拿起半袋瓜子给我:“大哥,你吃瓜子吧。”我说不吃。他自己抓了一把,在院子里站着嗑瓜子,我继续坐在马扎上,看他嗑瓜子。当天下午之前,在我心里一直感觉二弟还是小孩子,看着他比我还显老的脸一想,他1970年属狗的,已经55岁了,两个外孙都上小学了。

这时过来一阵风,吹得树枝猛烈摇摆。二弟说:“起风了,会不会下雨?”我看了下手机,说:“天气预报说晚上八点九点有雨,但不一定准。”二弟说起风了的时候,我突然想起我上初中时带他放风筝的事情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有一天老师让二年级的二弟背诵课文,二弟正在玩折纸,没有听见,老师批评他时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,二弟搬起板凳就要回家,老师把我叫出来劝阻二弟。二弟哭着说要回家,再也不上学了。我怎么说他都不听,我感觉给我丢了面子,当着两个老师的面,打了二弟一巴掌,二弟哭着回到教室。从那以后,二弟对学习彻底失去了兴趣,小学没毕业就回家了。我上初中一年级时,学鲁迅的《风筝》,文章说他弟弟小时候很喜欢扎风筝,鲁迅当时认为贪玩的孩子没出息,尽管弟弟经常偷着扎风筝,但每次都被他发现并踩个粉碎,弟弟无助地呆望着远处天空中别人的风

筝,他则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去。后来鲁迅读到一本儿童心理的书,了解到爱玩是儿童的天性,玩具是儿童的上帝。鲁迅去向弟弟道歉,弟弟笑着说:“有这回事么?”为了表示悔过,鲁迅亲自扎了风筝,领着弟弟一起去放,跑啊,笑啊,而此时他们都是长胡子的中年人了。学这篇课文时是冬天,二弟已经退学了,我认为有他老师的责任,也有我的责任,但二弟并没有什么想法,小小年纪天天很开心地跟着父母下地劳动。放学回到家,我对二弟说:“明年春天,我给你扎风筝放。”二弟惊喜地睁大眼睛:“春天吗?春天还有几天?”我们都盼着春天快些来到,那年的冬天显得特别长。第二年的清明节,我找好竹片、报纸、糨糊,一个人忙活了一下午,扎好了一个最简单的五星风筝,二弟、三弟和邻居家的小孩在旁边看了一下午。我们来到村外田野,我扯线,二弟双手托着风筝,他一松手,我边跑边放线,风筝在风中摇摆不定,二弟和一群孩子开心地欢呼着。过了一会儿,二弟说他要放线,我托着风筝,每次都是飞一两分钟就落下来了。二弟从未有过的高兴,一遍遍地放着风筝,一次次地叫喊着。至今我只放过那一次风筝,后来上高中、上大学、参加工作,再也没有放风筝的念头。

1988年9月,我去武汉上学报到那天,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,母亲骑着二叔家的自行车载着我的被褥,二弟骑着五叔家的自行车载着妹妹。从家到单县汽车站,一直到车开动,二弟都没有说过一句话,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很高兴。第一个寒假前,我给家里写信说了哪天到单县,但不能确定到单县的准确时间。二弟一大早就骑自行车到单县汽车站等我,因为识字不多,每进站一辆车他就到车门口看看下车的人有没有我。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和长了冻疮的手,我接过自行车说:“我来驮你吧。”之后大学期间每个假期去武汉、回单县,都是二弟骑自行车到单县汽车站接送我。

1989年暑假,我去菏泽找高中同学瑞兵玩,决定带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去菏泽,让他们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的。二弟说:“地里这么多活,我就不去了,你带小常(三弟)和小真(妹妹)去看吧。”

1990年,我上大二期间,二弟结了婚。因为不在假期里,我没有参加他的婚礼。他先后有了一个女儿、一个儿子,儿女双全,这在农村是非常有面子的。二弟媳妇很能干,也很会管家,二弟对家里的钱从来不问,挣了钱都交给媳妇,花钱的事情也从不操心。

我村里人均三亩地,全家有二十多亩地。从小学到初中,学校每年放“麦假”让学生回家帮着收麦子,是学习体会古文“汗滴禾下土”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最佳机会。气温像烤火,麦芒如针尖,为了凉快一些,凌晨天不亮就下地,弯腰用镰刀收割,连续几天累得直不起腰,胳膊上都是红点,又痒又疼。我上高中后没有“麦假”,我的“工作量”由父亲和二弟分担了。1993年4月,我参加工作半年多,父亲脑溢血偏瘫在床,二弟的劳动量更大了,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。二弟好像有使不完的劲,从来不抱怨、不着急、不偷懒。

2000年左右,村里的土地被陆续征收租用,村民不用再辛苦种地了,每年可以领到土地租赁费,年轻人外出打工,老年人在家打牌。一个姓鹿的邻居组织了一个建筑队,二弟跟着干“下工”,主要是搬砖、提水泥,负责砌砖垒墙的叫“上工”。最初“上工”一天工资100块钱,“下工”50块,几年后“上工”一天150块,“下

工”70块。有一年春节,在单县四君子酒厂工作的姓赵的初中同学来家找我,了解二弟的情况后说:“提泥兜子太累了,我跟厂领导说说,让二弟去酒厂干吧。”过了一段时间听说,赵同学把我二弟领到酒厂,安排在仓库负责给原料进库过磅,工作确实比较轻松。但二弟看不懂磅,特别是每次过磅需要加秤砣,算起来更加复杂,同学耐心教了两天,二弟硬着头皮学了两天也没有学会。同学想给二弟换个工种,二弟没同意,说“我就适合干出力的活”,又回到了邻居的建筑队。建筑队全是本村的人,二弟都熟悉,干活活互相开着玩笑,心情很放松,每天午饭管一顿大锅菜,可以吃到几片肉。二弟很喜欢这种状态,有时会哼唱几句不标准的豫剧。

不知不觉在院子里坐了一个多小时,我站起来想活动活动。我看二弟还在嗑瓜子,就说:“瓜子不宜多吃,含盐高,对血压不好。”二弟说:“平时不大吃,有时候想起来了就吃点儿。”我问他:“你现在还喝酒吗?”他说:“多少年都不喝酒了。”我说:“一定不要喝酒。平时少吃咸菜、少吃辣椒,肥肉也别多吃,早晚多散步,每天自己量量血压。”二弟说:“家里的血压计可能不准了,没大量过。”我说:“我再给你买个新的。”

我家族有遗传性高血压,当年爷爷奶奶、父亲、村里人都没有高血压的概念,不知道吃药预防,平时生活饮食也不注意。村里有红白喜事或者逢年过节走亲访友,别人劝酒,就实实在在地喝,因为酒量都不大,经常一喝就吐。父亲是51岁脑溢血,二弟是35岁脑溢血。2005年春天,二弟正在邻村工地上搬砖,感觉头晕得厉害,姓鹿的邻居就安排人用自行车把他送回家休息。刚到家,和母亲说了几句话,就休克倒在地上,邻居马上打120将二弟送到了医院。我连夜从济南赶到单县中心医院,二弟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,昏暗的灯光下,有那么一会儿,我感觉病床上躺着的是父亲,当年父亲也是在这个神经内科病房躺了七十多天。二弟因为比较年轻,出血量少,输液保守治疗了二十多天。康复以后,二弟就离开了他非常喜欢的建筑队,离开了那些天天在一起干活、一起笑闹的工友,二十年了也没有喝过酒。

母亲不敢让二弟再从事重体力劳动,就在村里开了一个很小的“顺心超市”,卖些日常用品,赚不了多少钱。每天可以见到邻居来买油盐酱醋,或者有老年人在超市门口打麻将,二弟帮着倒倒水,互相说说说话,都很高兴。我回家时看到超市里有三部公用电话,三个不同的电话号码,不禁感慨世界变化太快,父亲没有看到。不到两年时间,公用电话都撤了,因为多数人有了手机。

二弟看了看他的手机,说:“都快五点了,小常还没回来,不知道是去城里玩了还是去浮龙湖了。”我说:“你不去玩玩?想去浮龙湖吗?我明天上午拉你去看看。”二弟说:“听说过节人很多,浮龙湖我以前去过,不再去了。”二弟到单县之外的城市屈指可数,我记得他只去过济南、泰安、聊城。我女儿出生后,他和弟媳、母亲一起去济南,晚饭时我特意要了他们之前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的海参,结果三个人吃到嘴里都吐出来了,说“太难吃了,不如猪肉羊肉好吃”。2019年10月,侄子考上泰安一所大学的专科,虽然是专科,但在家人和邻居心中也是大学生,都很高兴也很自豪。报到时侄女开车,带着全家人去泰安,我从济南赶

过去,一起办理报到手续。在校园里我对二弟和弟媳妇说:“你家也算是有大学生了,你们看看,这校园多大、多漂亮!”二弟说:“这学校真不孬。”幸福表情如同当年父亲送我去武汉上大学一样,不同的是二弟送儿子到了学校,父亲送我只送到了商丘火车站。办完报到手续,我和母亲、二弟全家一起登上了泰山,我特意用手机多给二弟拍了一些照片。2021年我到聊城工作后,二弟又来过一次聊城,上午到聊城,吃完午饭就回单县了,什么景点也没有看。

2006年,单县成立开发区,弟弟超市门前修了很宽的创新路,路两侧栽种了长长的垂柳。开通了公交车,设了“王土城村”站牌。弟弟望着家门口的路灯说:“咱这和城里一样了。”母亲说:“不是和城里一样,咱这就是城里。”

2008年王土城村划归新成立的园艺街道办事处,村子周边新修了三条路,新建了单县一中两个校区,还有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,县里也有了拆迁王土城村的规划。在住楼房的美好期待中等了几年,到了2015年,还没有拆,看看母亲年近七十,我和弟弟妹妹商量,先在城里买套房子,让母亲和二弟一家住。当时房价还没有大涨,最好的小区三千多元一平方米。我提议,我、三弟、妹妹三家,每家出十万元,剩下的十几万元由二弟家承担。四家都很愉快地同意,当天就看房选好了房。2016年初,母亲和二弟全家住进了城里的楼房,距离王土城村有两公里左右。

2020年国庆节期间,王土城村被几台大推土机推平了,陪伴二弟十多年的“顺心超市”也拆了。在原址建的回迁小区叫“湖西印象”,公交站牌也改为“湖西印象”,王土城村从单县的地图上消失了。因为补偿比较到位,全村人都很支持。村里很多家庭买了汽车或者电动车,二弟家买了一辆汽车、一辆电动车。我对二弟说:“你家补偿的这几套房子,按现在的市场价,你也算是百万富翁了。”二弟说:“有这么多吗?”

二弟把手里的瓜子吃完,走到我旁边坐下来,说:“家里养的鸡都长大了,你回聊城的时候杀两只带着吧。”我说:“不用给我,家里留着吃就行。”二弟说:“咱娘说佳佳喜欢吃,你带回济南给佳佳吃。”

这时,表弟打来电话,说请我全家晚上去他家里喝鸡汤。我看看手机上的时间,已经陪二弟三个多小时了。我说:“你跟我去喝鸡汤吧?”二弟说:“你去吧,天快黑了,一会儿我骑车子回时代广场吃饭,看看小常回来没有。”

原计划4日早饭后回济南,临时决定和二弟一家一起吃顿午饭再走。就在二弟的小院内,我一家,二弟一家,三弟一家,二弟的女婿一家,十六个人,分成两个小桌,坐不开,只能轮流吃。就一个菜,地锅炖鸡和蘑菇,两大盆,二弟养的鸡确实好吃,贴的死面饼子,我吃了三个。

临上车前,我望着从小风吹日晒却一脸平静的二弟,突然感觉非常欣慰。二弟没有学历,可以说没有什么文化,没有工作,没有到全国各地旅游过,没有去过大城市,没有见过世面;但他有孝顺的儿女,有两个活泼的外孙,晚上有城里的房子住着,白天有一个养鸡种菜的院子;每天都不用考虑复杂的事情,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他操心去解决,始终处在对生活知足满足的状态——他的幸福指数比我高多了。

可以说,他比很多人都幸福。二弟的幸福,也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。他的幸福,只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。